

# 香港傳真

(香港)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12-13

2012 年 3 月 29 日

\*\*\*\*\*

## 關於“三壟斷導致蘇聯解體”等 相關說法的辯駁

清華大學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劉書林

隨著時間流逝，在蘇聯解體 20 年的時候，關於蘇聯解體的原因卻在國內外的思想理論界吵得越來越熱了。不同的觀點，衆說紛紜，大相徑庭，單憑簡單的善良願望會覺得眼花繚亂、無所適從。“美國之音”把蘇聯在 1991 年 12 月 25 日正式宣佈解體稱作“一份反共產主義的人期盼了 70 年的聖誕禮物”；俄羅斯前總統普京則稱之為“20 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sup>1</sup> 關於這場災難的責任者，有的人把仇恨的目光盯住了早在 59 年前逝世的斯大林，說他建設的蘇聯

---

<sup>1</sup> 盧長銀等：〈世界冷議蘇聯解體 20 年〉，《環球時報》2011 年 12 月 26 日，第 1 版。

模式和制度葬送了蘇聯；<sup>2</sup> 更多的人指責戈爾巴喬夫等上層集團的背叛，認為是蘇聯執政黨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的變質和黨內叛徒集團背叛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背離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最後遭到拋棄。<sup>3</sup> 看來，在一個存在著階級的世界和社會裡，要對某一政治現實取得一致的評價，是不可能的。但是，看看各種人物的歷史的來龍去脈和一貫主張，人們就不難發現其主張的本質及其動機的真實基礎。人們對歷史和國外問題的看法，往往反映了人們對現實和國內問題的態度和主張。努力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拂去扭曲歷史真相的泡沫，看清歷史發展的規律，對歷史事實和歷史人物做出符合歷史潮流的評價，還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李凌在《香港傳真》No.2011~64 期發表〈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的文章，特別是他提出的所謂“‘三壟斷’導致蘇聯解體”的說法，很有代表性。本文集中對此文的這一觀點進行討論和辯駁，同時也涉及相關的觀點。

## 一、宣揚“三壟斷導致蘇聯解體”， 矛頭指向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歷史上，由於歷史的和現實的許多因素，可以說，在改革中是否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一個國家改革成敗的決定性因素。凡是執政黨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國家，無論改革過程充滿多少曲折和失誤，最終總能夠摸索到成功之路，使自己的國家走向繁榮和發展；凡是執政黨已經變質，把社會主義制度

---

<sup>2</sup> 陸南泉等主編：《蘇聯真相》，新華出版社 2011 年，第 493 頁。

<sup>3</sup> 李慎明主編：《居安思危——蘇共亡黨 20 年的思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1 年，第 17 頁。

視為“舊制度”，把馬列主義視為死教條，改旗易幟，拋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國家，必然滅亡。這是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屢試不爽的教訓，也是 20 世紀 80 年代的衆多社會主義國家改革浪潮的基本經驗。值得注意的是，現在有人想千方百計地以搞垮蘇聯的思路，運用到我國，妄圖搞垮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這涉及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是不能不弄清的大是大非。

### 1、把抨擊的矛頭從蘇共轉向蘇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邏輯不能成立

李凌的文章把蘇聯垮臺的基本原因集中到了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或者斯大林模式上。他是怎樣引出這樣一個結論的呢？

對於蘇聯垮臺的原因，他首先否定了西方和平演變說，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說，經濟失敗說，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說，最後歸結到一點：“蘇共已嚴重脫離了群眾，盡失人心，遭到了普遍的唾棄”，“這才是蘇共垮臺的主要原因”。<sup>4</sup> 本來，作者在這裡已經抓住了導致蘇聯垮臺的主要原因：蘇共特別是蘇共領導集團的蜕化變質導致蘇聯垮臺。

但是，作者在這裡並沒有繼續追究蘇共及其領導集體蜕化變質的原因和過程，卻虛晃一槍，轉而把矛頭對準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他認為，是制度導致蘇共垮臺。作者借用了久加諾夫的話說：“蘇共之所以垮臺，是由於在長期一黨專政的制度下，實行了‘三壟斷’。”“即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壟斷經濟利益的封建特權制度和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管理制度。”<sup>5</sup> 這樣，李凌就把蘇共垮臺的主要原因偷換為“從斯大林的統治開始”的基本制度。蘇共的垮臺，讓此前已經逝世 38 年的斯大林承擔罪責，

---

<sup>4</sup>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香港傳真》No.2011~64 期，第 2 頁。

<sup>5</sup>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香港傳真》No.2011~64 期，第 3 頁。

這種邏輯是非常可笑的。

轉向這個抨擊目標的邏輯也是不能成立的。首先，作者從蘇共領導人引向了制度，說：“造成這種情況，蘇共歷任的第一把手們當然不能辭其咎，但根本的原因還是應從制度上去找。”<sup>6</sup>

為了完成這個邏輯的轉變，李凌引出了鄧小平 1980 年 8 月 18 日的講話。鄧小平在這個講話中說：“過去發生的多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sup>7</sup> 在這篇講話中，鄧小平還解釋了這裡講的“制度”是指“具體的組織制度、工作制度”，<sup>8</sup> 不是作者後面概括的“三壟斷”的制度，更不是指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所以，鄧小平的這番話根本幫不了這個邏輯的忙。李凌抨擊的制度和鄧小平所講的制度根本不是一回事。還是在這篇講話中，鄧小平特別強調了不能否定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值得李凌先生注意。鄧小平說：“我們的黨和人民浴血奮鬥多年，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儘管這個制度還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壞，但是無論如何，社會主義制度總比弱肉強食、損人利己的資本主義制度好得多。我們的制度將一天天完善起來，它將吸收我們可以從全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絕對不可能做到的。由於我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上犯過錯誤，就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認為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這種思想是完全錯誤的；由於要肅清封建主義殘餘影響，就認為可以去宣揚資本主義的思想，也是完全錯誤的。我們一定要徹底批判

---

<sup>6</sup>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香港傳真》No.2011~64 期，第 2 頁。

<sup>7</sup> 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冊，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第 217~218 頁。

<sup>8</sup> 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冊，第 221 頁。

這種錯誤思想，絕對不能讓它們流行。”<sup>9</sup> 所以，只有全面理解鄧小平的這篇講話，才能對問題有正確的把握。

然而，李凌卻從這個不成立的起點出發，不是抨擊戈爾巴喬夫集團的蜕化變質和出賣社會主義事業，而是集中抨擊斯大林代表的社會主義根本制度。他說：“從斯大林的統治開始，幾十年的暴政以及長期的腐敗，像火山噴發後結成的熔岩，積累起來，壓在戈爾巴喬夫身上，他雖然發現了問題，但也無力扶大廈之將傾，挽鉅瀾之既倒。”<sup>10</sup> 這樣，作者竟然為直接背叛和出賣社會主義事業的戈爾巴喬夫開脫，反而不合邏輯地把罪責加在斯大林建立的基本制度身上。蘇共垮臺、蘇聯劇變，似乎不是戈爾巴喬夫叛徒集團的罪過，反而成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罪過。

李凌的這個邏輯發生了極大的混亂，結論荒唐可笑。

另外有些人的說法倒是還有些欺騙性，他們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稱作“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或者“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從而加以否定。但是，如今這種邏輯也騙不了人。許多學者對這種邏輯做出了深刻分析。所謂“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或者“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是應該進行分析的，不能簡單當作否定的對象。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中包含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是正確的，基本符合社會主義現階段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質和共性的體現，是至今必須堅持的；只有其中與當時情況和蘇聯國情相關的特殊部分，以及在實踐中發生錯誤的部分，才是不能簡單學習和照搬的。當時，蘇聯是世界上唯一的經歷過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家，學習蘇聯沒有錯，只有不加分析地照搬才是錯誤的。合理的改革

---

<sup>9</sup> 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冊，第222頁。

<sup>10</sup>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香港傳真》No.2011~64期，第2頁。

只能改變那些簡單照搬的部分，絕對不能把整個所謂“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當成否定的對象。從某種意義上說，蘇聯的垮臺，不是由於堅持了“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中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而恰恰是背叛了“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中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斯大林堅持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被李凌稱作“三壟斷”，按照這種話語體系，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被稱作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堅持社會主義的公有制被稱作壟斷經濟利益的封建特權制度，堅持馬列主義的指導地位被稱作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管理制度。如今蘇聯劇變20年了，人們都清楚，蘇聯到底是由於堅持這些基本制度而垮臺，還是由於丟掉了這些基本制度而垮臺。作者講的“三壟斷”到底是不是上述分析的本來含義，不妨對“三壟斷”的內涵和本質做一番分析。

在中國的新時期，鄧小平把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概括為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明確說，“也就是說，我們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sup>11</sup> 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也強調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的是科學社會主義原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確、之所以能夠引領中國發展進步，關鍵在於我們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徵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sup>12</sup> 李凌抨擊的共產黨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對經濟利益的壟斷、對真理解釋權的壟斷，實際上已經把矛頭對準了科學社會主義的這四項基本原則。雖然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不能用“三壟斷”來概括，但是李凌的文章否定“三壟斷”的本質，實際上把矛頭對準

---

<sup>11</sup> 鄧小平：〈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思想基本原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冊，第45~46頁。

<sup>12</sup>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彙編》，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頁。

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按照李凌文章的說法，實際上就是說社會主義制度站不住，蘇聯之所以解體是因為蘇聯體現的這個基本制度必然垮臺。如果這樣說，請問李凌是怎樣對待中國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呢？

## 2、所謂“對政治權力的壟斷”

李凌在文章中指出：“所謂對政治權利的壟斷，即享有不受任何監督、任何制約的權力。而這種權力，只有在一黨專政或變相的一黨專政情況下才能發生。斯大林統治蘇聯近30年的劣跡就是這種壟斷的惡果。”他還說：“蘇共長期堅持一黨專政，任何不同聲音和發表不同聲音的人，很快被鎮壓下去。執政黨和官員們即使犯了多大的錯誤和罪惡，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約它，廣大群眾長期積壓起來的憤怒一旦爆發，便會形成摧毀整個舊制度、使國家改變顏色的鉅大力量！”<sup>13</sup> 一句話，李凌認為“一黨專政”（即共產黨長期佔據執政地位）是導致蘇聯劇變的基本原因之一。

這就完全顛倒了是非。誰人不知，蘇聯的劇變是由於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黨內的叛徒集團修改了憲法，取消了憲法第六條規定的蘇共在國家的執政地位，然後才迅速走向滅亡的。與之相反，共產黨在將近70年的時間裡根據憲法長期執政，並沒有導致劇變。把蘇聯劇變的罪責歸於斯大林30年的統治，更是不著邊際。

在蘇聯劇變20年後，俄羅斯人民經歷深刻的反思，一致認為蘇聯劇變原因是蘇共的變質和背叛。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瓦·伊·茹科夫在總結蘇聯劇變教訓的時候指出：“蘇聯崩潰的罪責應由蘇聯共產黨來承擔，由1953年以後斯大林的接班人蘇共領袖們來承擔。”<sup>14</sup> 他

---

<sup>13</sup>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香港傳真》No.2011~64期，第30頁。

<sup>14</sup>（俄）瓦·伊·茹科夫：〈“改革”：總結和教訓〉，《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第906期，第14頁。

的分析真是一針見血。俄共主席團成員德·格·諾維科夫也認為：“執政黨——蘇聯共產黨的危機促進了蘇聯崩潰。改革的思想家宣稱將國家‘非黨化’。1990年，蘇聯憲法中宣佈蘇共在蘇維埃社會政治體系中的領導和指導作用的第六條被取締，其結果是打斷了國家管理體制的關鍵環節。”<sup>15</sup> 這個分析擊中要害。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葉·庫·利加喬夫對憲法取消第六條一事評論道：“這是個大錯誤，這是毀滅性的開始。取消憲法第六條就是否定、取消黨的領導。”<sup>16</sup> 原《真理報》主編根·尼·謝列茲尼奧夫說：“憲法第六條取消了，這就像一座大廈的頂樑柱一樣，把頂樑柱抽掉了，（國家這座）大廈也就倒塌了。”<sup>17</sup> 這些俄羅斯政治家經過反思而進行的分析充分說明：蘇聯的解體不是由於堅持了所謂“一黨執政”，而是由於取消了黨的領導而垮臺。

在社會主義國家，亡黨必然亡國。蘇聯劇變和崩潰，就是由於失去了真正意義上的共產黨的領導，而決不是由於共產黨居於執政地位。實際上，把抨擊的矛頭對準所謂黨的“壟斷政治權力”或“一黨執政”，這不是避免出現崩潰和劇變的主張，而恰恰是推動和促成崩潰和劇變的主張。

試看李凌先生的描述，他的邏輯實際上就是肯定蘇聯劇變的合理性。他竟然讚美蘇聯劇變和葉利欽篡權的合法性。他說：“俄羅斯的人民寧願忍受改革的陣痛，也堅持政治改革，用一次又一次的全民公決和總統選舉，表明人民寧願拋棄什麼，需要什麼。”“葉利欽是政

---

<sup>15</sup>（俄）德·格·諾維科夫：〈蘇聯崩潰的原因：俄羅斯國內爭論的若干結論〉，《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第906期，第7頁。

<sup>16</sup>“居安思危之三”課題組：〈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俄羅斯人在訴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第960期，第17~18頁。

<sup>17</sup>“居安思危之三”課題組：〈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俄羅斯人在訴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第960期，第18頁。

治改革的倡導者、執行者。……人民群眾通過一次次的全面公決表示了對他，也是對改革的支持。”“全民公決解決了國家重大變革的合法性問題。”<sup>18</sup> 由此看來，李凌的政治常識等於零。試問，今日有良心的俄羅斯民衆，有誰願意忍受這種劇變的陣痛還去堅持這夥無恥的社會主義的叛徒們的瞎折騰的“改革”！葉利欽在總統選舉中當選，就說明人民支持他嗎？需記得：當年的希特勒也是在選舉中獲勝而當選為總理和元首的。每屆當選的美國總統也能夠說是美國人民的選擇嗎？至於全民公決，請不要忘記，蘇聯人民還曾經通過全民公決以 76.4% 的多數贊成保留蘇聯。後來還不是被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之流的叛徒一筆抹殺了嗎？一次全民公決，就能夠解決劇變的“合法性問題”嗎？

經過一番曲折的論證，李凌心儀的政治改革的理想就表達出來了。他的政治理想實際上就是實行西方憲政下的多黨制。他的政治標準完全是西方多黨制的標準。李凌指出：“他們選擇憲政民主，選擇了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俄羅斯頒佈了《政黨法》，根據該法，各個政黨在司法部註冊後，就可進行活動，提出本黨的政綱、總統和議員候選人的名單，進行競選。”<sup>19</sup> 這不是地地道道的西方多黨制麼！這一切正是這場災難的後果，而李凌卻把它稱作“進步”！他還說 1993 和 1995 年的選舉達到了“自由公正”，1999 年和 2000 年的選舉“完全達到了普遍認可的國際標準”。<sup>20</sup> 讀到這裡，李凌的一切論述真相大白。但是這也露出了最大的一個破綻：請問 1993 年的選舉也達到“自由公正”的水平嗎？葉利欽使用大量的坦克、大炮和機關槍向議會大樓開火的、震驚世界的“黑色十月事件”也達到了“自

---

<sup>18</sup>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香港傳真》No.2011~64 期，第 52 頁。

<sup>19</sup>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香港傳真》No.2011~64 期，第 53 頁。

<sup>20</sup>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香港傳真》No.2011~64 期，第 53 頁。

由公正”的水平嗎？以杜馬議長哈斯布拉托夫為首的議員在葉利欽的坦克、大炮、重機槍的射擊轟炸面前統統被打成“叛亂集團”，遭到逮捕，據官方宣佈，這場流血衝突造成 187 人死亡，437 人受傷。<sup>21</sup> 這種人類歷史上罕見的醜聞，就叫做達到“自由公正”？什麼人才能有這種偏邪的判斷？可見，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

在中國的改革中，宣揚蘇共因“壟斷政治權力”而垮臺，甚至鼓吹把政治體制改革的矛頭指向黨的領導，這是對中國政治安定團結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最大威脅。中國人民自從毛澤東時代就深深懂得：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科學社會主義事業的勝利。鄧小平在改革伊始的 1979 年 3 月 30 日，就明確提出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而且指出，這四條之中最重要的就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之所以不斷前進而沒有發生崩潰和劇變，就是因為我們牢牢堅持了這些原則。在 30 多年的改革中，之所以發生過 1989 年的政治風波和曲折就是由於我們堅持這些基本原則不夠一貫，有時有些領導人動搖了黨的領導這個根本原則。我們黨也正是由於堅決地解除了這些不合格的領導人的職務，才使得我國的改革繼續健康發展。這些教訓已經夠深刻的了。

### 3、所謂“對經濟利益的壟斷”

李凌在文章中指出：“蘇共對經濟利益的壟斷依靠的是一系列封建性質的特權制度。”<sup>22</sup> 作者把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有制誣衊為共產黨“對經濟利益的壟斷”，然後認為這也是導致蘇聯劇變的基本原因之一。

可以說，在這一問題上，作者的思路是自相矛盾的，結論是最蒼

---

<sup>21</sup> 余兵：〈炮轟議會大廈，政敵舉手投降〉，《環球人物》2007 年第 9 期。

<sup>22</sup>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香港傳真》No.2011~64 期，第 9 頁。

白無力的。作者本來是企圖否定共產黨堅持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但是，作者運用渾身的解數也很難證明這一點。相反，他卻不得不承認，正是蘇聯解體之後的私有化，“用法律手段保障官僚資產階級的順利生成”。<sup>23</sup> 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說蘇聯解體是由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方面的公有制導致的呢？

作者在共產黨“壟斷經濟利益”這一點上，也拼命想把罪責推到斯大林身上，可惜自己言不由衷，前後矛盾，不知所云。他不得不承認斯大林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斯大林本人在生活上也保持著簡樸的作風”，一件大衣就穿了15年，元帥服也打了補丁，斯大林妻子到工學院學習期間不坐汽車。作者還引用1932年斯大林的女兒的話：“我們的生活是非常樸素的。”<sup>24</sup> 儘管這樣，作者話頭一轉，十分武斷地說：“但是領袖個人一時的樸素改變不了這個制度。”為了證明這個經濟制度不好，他接著就毫無根據地扯出了一大堆證明斯大林生活作風腐化的事情：斯大林有許多兼職，每一兼職都會送來一袋錢，多到斯大林連封條都懶得打開，反正這個國家的財富都幾乎等於是他的。<sup>25</sup> 作者這樣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到底想把斯大林說成是一個什麼人呢？到底要說明什麼問題呢？作者一方面引用葉利欽《我的自述》中的話，說是在斯大林時代特權化就大肆蔓延，“一切都取決於官級高低”。<sup>26</sup> 接著同一句引語又用來說明蘇聯解體前夕的蘇共的情況：“葉利欽在他的書中指出，在他自己所處的那個時代，也就是蘇聯解體前夕，各級幹部在生活上享受各種等級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經形成了一種制度——‘一切都取決於官級高低’。”<sup>27</sup> 李

---

<sup>23</sup>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香港傳真》No.2011~64期，第16頁。

<sup>24</sup>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香港傳真》No.2011~64期，第9頁。

<sup>25</sup>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香港傳真》No.2011~64期，第10頁。

<sup>26</sup>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香港傳真》No.2011~64期，第11~12頁。

<sup>27</sup>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香港傳真》No.2011~64期，第14頁。

凌說的“一切都取決於官級高低”這種狀況，到底是斯大林時代的情況還是“蘇聯解體前夕”的情況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這種實用主義的引用是不嚴肅的。看來李凌對斯大林是不公正的，怎麼能夠把蘇聯解體前夕的幹部特權狀況，用來形容斯大林時代呢？這未免太隨意了。

看來作者要從斯大林時代建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之中找到導致蘇共變質和蘇聯解體的證據，簡直是太難了。斯大林時代建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無論存在什麼值得變革的地方，但與某些腐敗分子和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瓜分國家財產、化公為私相比，完全是性質不同的事情。

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共產黨人共產主義理想的基石。社會主義公有制也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物質保障。社會主義公有制也是一個國家之所以有資格稱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證據。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主義制度才不會變質，人民的權力才不會喪失。毛澤東說過：“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麼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sup>28</sup> 這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對於國家的前途命運的鉅大影響。

稍微顧及良心的人，誰人不知，斯大林本人和斯大林時代是以廉潔奉公的社會風氣為特徵的。這種風氣正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沒有被動搖和侵蝕的必然反映。而斯大林時代建立起來的這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卻被李凌說成“導致蘇聯解體的三壟斷”之一，而作者所崇拜的非“三壟斷”的經濟制度，卻是真正導致蘇聯解體的要素。所以，把

---

<sup>28</sup> 毛澤東：〈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年，第 213 頁。

壟斷經濟利益這一條拿來作為蘇聯解體的根據，是站不住腳的。

真正在經濟上成為蘇聯解體要素的人物，是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等人。這些特權階層的人物早就喪失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一心嚮往資本主義的世界，他們利用改革之機，咒罵公有制是共產黨“壟斷經濟利益”，或者胡說“公有制就是無所有制”。在這種否定公有制的煙幕下肆無忌憚地侵吞國有資產，化公為私，成為新生的資產階級。在關鍵時刻，他們為了使自己攫取的財產永遠屬於自己及其子孫後代享用，就成為推翻和破壞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主力。

就蘇聯的經濟基礎來說，實現公有制，是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由於其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怎麼科學地實現公有制才能有利於經濟發展，經濟體制到底怎麼規範和改革，不可能有現成的經驗借鑒。在漫長的發展中，出現曲折和失誤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事實證明，這個過程，並沒有成為導致蘇聯解體的條件。相反，與資本主義強國相比，蘇聯卻在較短的時間裡，積累了打垮德國法西斯的物質力量，進而成為一個超級大國。毛澤東說過：“任何一個民族，不可能不犯錯誤，何況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歷又那麼長久，不發生錯誤是不可能的。蘇聯發生的錯誤，像斯大林的錯誤，它的位置是什麼呢？是部分性質的，暫時性質的，雖然聽說有些什麼東西有 20 年了，但總是暫時的，部分的，是可以糾正的。蘇聯那個主流，那個主要方面，那個大多數，是正確的。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經過十月革命變成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建設了社會主義，打勝了法西斯，變成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它有許多東西我們可以學。”<sup>29</sup> 這就說明，蘇聯建立的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基本上適合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展示了自己的優越性。至於對不合理的部分進行改革，那也是

---

<sup>29</sup> 毛澤東：〈關於繼承黨的傳統〉，《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論黨的建設》第 193 頁。

必要的，但那畢竟是第二位的問題。

在蘇聯經濟領域，真正導致蘇聯崩潰的起點是取消公有制、實行私有化的“五百天計劃”。1990年8月，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共同商定，由經濟學家沙塔林院士起草一份《向市場經濟過渡——構想與綱領》（亦稱“五百天計劃”）。這個計劃方案不到一個月便匆匆忙忙出籠。這個計劃主張實行“非國有化”（實際上就是實行私有化），以塑造市場經濟的主體，規定在五百天內完成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這個計劃的實質就是取消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徹底改變國家的性質。1990年10月18日，戈爾巴喬夫以總統名義脅迫最高蘇維埃通過私有化的方針，公開主張：“需要儘快把大部分企業從國家包辦下解放出來，實行私有化。”<sup>30</sup>這是一個社會性質的根本變化。1991年7月1日，蘇聯最高蘇維埃竟然又通過《私有化法》，據此，蘇聯的企業到1992年底將有40~50%脫離國家的控制，到1995年將會有60~70%的企業脫離國家控制，國營企業可以變成租賃或集體企業、股份公司、可招標出售或拍賣。<sup>31</sup>同月，戈爾巴喬夫寫給西方七國領導人的信中進一步表白說，頭兩年將把蘇聯80%的中小企業賣給私人，然後，將進一步對大型企業實現私人經營。<sup>32</sup>所有制方面的這一重大舉措，從根本上消滅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這樣的私有化“改革”得以實現，共產黨的領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社會主義的制度，人民當家作主的國體，還能夠保存嗎？今天，全世界的進步人們和學者衆口一致（除了李凌這樣的人以外）認定戈爾巴喬夫的叛徒嘴臉，根據就是以私有化改變公有制這一條。私有化從根本上打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這不叫改革，這只能叫做背叛或者叛賣，

---

<sup>30</sup> 戈爾巴喬夫：〈穩定國民經濟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基本方針〉，《真理報》1990年10月18日，轉引自李慎明主編：《居安思危——蘇共亡黨20年的思考》第156頁。

<sup>31</sup> 黃宏、紀玉祥：《原蘇聯七年“改革”紀實》，紅旗出版社1992年，第552頁。

<sup>32</sup> 江流、陳之驊：《蘇聯演變的歷史思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106頁。

這只能叫做資本主義復辟。

就是因為消滅了公有制，蘇聯就徹底地、不可挽回地崩潰了，解體了。這才是事情的真相、劇變的根本原因，而絕對不是李凌說的什麼由於共產黨“對經濟利益的壟斷”。

#### 4、所謂“對真理的壟斷”

李凌所說的“三壟斷”的最後一項就是“對真理的壟斷”。李凌說：“所謂壟斷真理，實際上是一種對思想的鉗制，它的最初表現形態就是宣稱：只有黨的理論、理想、文件才是真理，必須無條件絕對服從，它是一切媒體、言論的導向。”<sup>33</sup>

李凌在這裡混淆了兩種是非判斷。

第一，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斯大林堅持黨的理論、理想，繼承和發展列寧主義，使馬列主義作為蘇聯的指導思想和意識形態的指導，貢獻卓著、名垂史冊，這一點他沒有錯；另一方面，斯大林也不是神仙，他的話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他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些指導也出現過與實際不符的情況，甚至犯過錯誤，這是任何人都難免的。這兩個方面不能混淆起來。不能把斯大林堅持馬列主義的主導地位誣蔑為“壟斷對真理的解釋權”。

任何社會的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無產階級政黨在實行了無產階級專政之時，必須堅持自己的主流意識形態，必須把揭示是非、解釋真理的權力抓到自己的手裡。只要不是宋襄公那樣蠢豬式的人物，對真理的這種解釋權是必須“壟斷”的，“壟斷”得越堅決而有效功勞就越大，就越值得讚揚。在這個問題上，決不能讓那些別有用心和胡說八道的陰謀家、野心家、修正主義分子取消或者戲說，也決不能聽任西方的誘導搞什麼“新聞自由”或者“公開性”。鼓吹取消共產黨對意識形態領導權的人物的嘴臉，這些年我們

---

<sup>33</sup>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香港傳真》No.2011~64期，第18~19頁。

看得夠多的了。他們打著“反對壟斷真理解釋權”和“新聞自由”的幌子，瘋狂地抨擊和誣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這樣的革命導師，把一些胡說八道、惡毒攻擊新興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捧上天，弄得社會輿論烏煙瘴氣。這樣就叫做解除了共產黨人對真理的“壟斷”了嗎？至於斯大林時期在管理意識形態方面的缺點和不足，這是另外一回事，他堅持意識形態的馬列主義導向是完全正確的。

事實證明：斯大林時期，蘇共在意識形態領域逐漸形成了積極向上、富於戰鬥性的輿論氛圍。他強調加強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鞏固社會主義的思想陣地，使得社會主義思想佔據主導地位；蘇聯人民相信社會公正，對未來充滿信心，各條戰線配合默契。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斯大林培養和鍛煉了一大批思想政治工作的幹部，有效地應對西方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挑戰。蘇維埃政權下培養起來的知識分子的新鮮力量佔80~90%，他們中許多人思想活躍，富有創造性，頗有天賦，求知精神旺盛，充滿活力。這是斯大林時代的驕傲！

當然，斯大林在意識形態方面也有缺陷和不足。在斯大林時期，有一批冒牌的投機分子混進了馬克思主義隊伍，他們不學無術，卻在黨政職務之外又把“院士”“教授”頭銜拿到手，但一遇到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這樣的叛徒，他們就成了反戈一擊的鬥士，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劇。在應對西方的敵對思想的進攻之中，思想批判進行得堅決有力，但也有簡單化的現象，沒有注意團結盡量多的人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服務。但是這些缺點和不足是前進中的問題，是事後的反思的體會，都是可以調整解決的，決不是造成蘇聯垮臺的原因。

第二，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這類人，缺少馬列主義理論修養，受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影響，逐步背離馬列主義，理論與實際脫節，同時他們又利用手中的權力一意孤行，壓制不同意見，鎮壓群眾的不滿和反抗。這確實屬於“鉗制思想”的專制行為。這些修

正主義者利用自己撈到的共產黨的權力，在思想理論上顛倒黑白、指鹿為馬，掩蓋自己的背叛馬列主義的本質，鎮壓人民的正義的反抗，宣佈“朕即真理”，確實值得譴責和揭露。他們不僅是“壟斷真理”，實際上他們是背叛和歪曲真理、背叛和鎮壓群眾。李凌著力揭露的是這樣的披著共產黨人外衣的叛徒嗎？

在分清這樣兩個方面的問題之後，我們就能夠比較清楚地比較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的是非了。

李凌把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概括為“壟斷真理，對思想的鉗制，對思想文化的專制”，“最終導致蘇共垮臺、蘇聯解體”。<sup>34</sup>但是他卻把打擊的重點集中到斯大林身上：他說，“這種情況，在斯大林統治期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sup>35</sup>而真正壓制不同意見、理論與實際脫節、製造“夜間人”等消極現象的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卻只是被李凌輕描淡寫地批評為“智力水平和管理水平都很低下”，“差不多都是些雜牌學校出來的，什麼函授學校、黨校訓練班之類”，“基本文化科學素質都十分欠缺”。<sup>36</sup>這不是問題的本質。李凌對斯大林的攻擊確實抓住了本質的問題。但是這些本質問題在李凌那裡都是黑白顛倒的，或者是極端片面的。

第一，李凌攻擊斯大林背離馬列主義，隱瞞列寧的遺囑，毫無根據。

李凌說：“斯大林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和馬列主義背道而馳的，但是卻被認為是對馬列主義的發展，他所主編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被奉為學習馬列主義的經典。”<sup>37</sup>這個話說得太離奇了。斯大林的所作所為怎麼能說是與馬列主義“完全背道而馳”呢？人

---

<sup>34</sup>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香港傳真》No.2011~64期，第23頁。

<sup>35</sup>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香港傳真》No.2011~64期，第19頁。

<sup>36</sup>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香港傳真》No.2011~64期，第25頁。

<sup>37</sup>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香港傳真》No.2011~64期，第20頁。

所共知，斯大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修養是其後任何一屆蘇聯領導人都無法比擬的。斯大林忠誠地繼承和發展了列寧主義。斯大林執政期間，沒有使自己的前輩列寧的聲譽受到任何的傷害和玷污。他根據蘇聯的新情況堅定地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當時全世界最高水平的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也有許多缺點和錯誤，但是那是枝節的問題，非本質的問題，他絕對沒有在原則上背離馬列主義的缺點和錯誤。正是因為如此，他才被稱作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至於斯大林指導下完成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被奉為學習馬列主義的經典，這也是無可非議的。1938年《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的年代，正是蘇聯史學界經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後。這本書總結了全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集體智慧，對蘇聯歷史有一套基本穩定的解釋。特別是斯大林親自寫作的第四章第二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不但準確地、系統地總結了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的基本原理，而且有所發展，便於大眾化地傳播。這一節內容也是培育中國第一代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學者的基本教材。這樣的書當成經典有什麼不對？難道把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新思維》或者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這些胡說八道的騙人的東西當成經典才是合情合理的？只有在叛徒戈爾巴喬夫主政的1987年7月，被反蘇勢力控制的《消息報》載文譴責蘇聯中小學的歷史教材，並說《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每一個字都充滿了謊言”。<sup>38</sup> 今天李凌學著當年《消息報》的口吻說：“這本書大量歪曲事實。”<sup>39</sup> 這不是拾人餘唾嗎！

其實“大量歪曲事實”的是李凌。比如，李凌歪曲事實，捏造斯

---

<sup>38</sup> 李宏：〈蘇共亡黨的傳媒因素〉，《紅旗文稿》2011年第8期。

<sup>39</sup>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香港傳真》No.2011~64期，第20頁。

大林“隱瞞列寧遺囑”就是一例。他說：“這就是所謂‘列寧的政治遺囑’，但卻被斯大林長期隱瞞起來，知道此事的許多人都被殺掉。這樣他就以列寧事業的唯一合法繼承人的身份控制整個黨。”<sup>40</sup> 真想不到，時至今日，李凌還承襲當年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中捏造的口實來誣衊斯大林。史實早就粉碎了這些加在斯大林身上的誣衊不實之詞。列寧在特定的環境中關於斯大林的性格和建議把斯大林從總書記的崗位上撤下來的一組談話記錄文件是在列寧逝世（1924年2月21日）之後，在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夕，由列寧的遺孀克魯普斯卡婭於1924年5月18日送交中央委員會的。<sup>41</sup> 5月21日，加米涅夫代表“列寧文件接收委員會”便在特別會議上通報了情況，並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宣讀了列寧的以上遺囑。宣讀之後，政治局委員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發言，建議向代表大會的“全體代表”傳達列寧的遺囑。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由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主持。代表大會閉幕後兩天，斯大林就在第一次中央全會上提出解除自己的職務，結果中央全會仍然選舉斯大林為總書記。列寧的政治遺囑，每一個代表大會的代表都知道，只是沒有在當時的報刊上發表。因為列寧的文字是寫給中央委員會的，沒有說在報刊上發表。<sup>42</sup> 1927年10月，斯大林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公開地談論了自己對列寧遺囑的內容的看法。在斯大林的主持下，這個談話不久發表在11月2日的《真理報》上，列寧的遺囑文件收入了1927年12月召開的蘇共十五大的會議記錄和大會的第30號公報中。事實證明，斯大林在對待列寧遺囑的問題上，是光明磊落的，絲毫不存在什麼“長期隱瞞”的問題。斯大林成為繼承列寧的領袖，當時在蘇共黨

---

<sup>40</sup>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香港傳真》No.2011~64期，第20頁。

<sup>41</sup> 轉引自《列寧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58頁。

<sup>42</sup> 參見《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52頁。

內是衆望所歸、人心所向、黨心所向。既然事實清楚，任何公正的人都不應該再重複赫魯曉夫當年大反斯大林時的造謠誣衊，總是把“講實話”、“講真話”掛在嘴上的李凌先生也不應該例外吧！

第二，李凌採取移花接木、張冠李戴的手段，把蘇聯人民思想的沉寂局面和出現“夜間人”的現象嫁禍於斯大林，這很不地道。

李凌在描述 20 世紀 30~40 年代斯大林使得人民“不敢講真話、說實話”的情況時說：“迫於強大的壓力，絕大部分人都選擇了扮演‘夜間人’的角色。他們白天處處注意與官方保持一致，到夜間便過自己的生活，與家人和朋友議論時政、揭露時弊、抨擊權貴，閱讀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話，私下表達對現實政治生活的不滿。”<sup>43</sup> 請問這是出現在斯大林時代的事嗎？李凌這段話如果不是從陳之驊先生主編的《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這本書的第六章第三節“‘夜間人’現象以及社會思潮的人道化”那裡逐句抄出來的，<sup>44</sup> 就是從李慎明主編的《居安思危》這本書裡抄出來的，語言排列都沒有多大的改變。<sup>45</sup> 這裡，就不討論李凌抄襲的問題了，只是應該直言相告：以上兩本書裡的這些話都是專門針對勃列日涅夫時期說的，不要拿來張冠李戴地抨擊斯大林時代。

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革命的批判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生命力在於立足現實生活，指示人們前進的方向。但是，勃列日涅夫哪裡有這樣的本事？他說，“意識形態 — 不是他的管轄範圍”。“他提醒發言稿代寫人的指示很典型：‘寫簡單點，別把我搞成理論家……誰會相信，勃列日涅夫讀過馬克思的著作？’”<sup>46</sup> 這樣的人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以其昏昏怎能使人昭昭？他處理意識形態問題的辦法就是

---

<sup>43</sup>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香港傳真》No.2011~64 期，第 21 頁。

<sup>44</sup> 參見陳之驊：《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 年，第 122~123 頁。

<sup>45</sup> 參見李慎明主編：《居安思危 — 蘇共亡黨 20 年的思考》第 233 頁。

<sup>46</sup> (俄)亞·維·菲力波夫：《俄羅斯現代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9 年，第 233 頁。

簡單化。面對著豐富而生動的現實，他不是依事說理，不是擺事實講道理，不能深入思想問題的實際開展深入的討論。這樣就窒息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生命力。60年代後半期蘇聯出現了以《十月》雜誌為中心反思和分析過去“解凍”、力圖恢復斯大林名譽的思潮，勃列日涅夫對這一思潮採取了嚴厲的措施；當時還出現了以《新世界》為中心的反對斯大林堅持的基本制度的思潮，勃列日涅夫也不允許，將主編趕出了雜誌社；1973年亞·伊·索爾仁尼琴寫信主張放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勃列日涅夫翌年便把他驅逐出境；對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安·德·薩哈羅夫，勃列日涅夫的手段則是解職、流放外地。<sup>47</sup> 思想理論的是非不搞清楚，不敢放手讓人們討論，不敢依靠群眾把是非弄清楚，簡單的行政處分只能解決一時的穩定，但卻積壓矛盾，而不能解決矛盾。這就是勃列日涅夫時期出現意識形態方面一些消極現象的緣由。

在意識形態領域，真正在行動上實行“壟斷真理解釋權”、“鉗制思想”的是背叛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戈爾巴喬夫。在1988年蘇聯的改革中，那位真正的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主導地位、維護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大學教師安德列耶娃發表的《我不能放棄原則》，尖銳地揭露了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醜化革命歷史的本質，揭露了那些誣蔑斯大林的人的反動立場，揭露了資本主義復辟勢力的猖狂活動，指出了改革的領導權在哪個階級的手裡是個根本問題。這些意見激起了絕大部分黨員幹部和群眾的共鳴，今天看來更加顯示了其真理性。但是戈爾巴喬夫卻如臨大敵，召開了兩天的政治局會議，一意孤行、力排眾議，蠻橫地把這封信定性為“反對改革的行動綱領”，親自出馬讓雅科夫列夫、梅德韋傑夫寫文章予以反擊，並在《真理報》發表，以官方的權勢向安德列耶娃施加壓力。他還試圖通過基層黨的組織開

---

<sup>47</sup>（俄）亞·維·菲力波夫：《俄羅斯現代史》第216~217頁。

除安德列耶娃的黨籍和公職。戈爾巴喬夫大叫“不能有兩種意見”，“像斯大林當政時的那種社會主義，我們不要”！“你們如果誰要宣稱有同樣的理念，最好離開！”<sup>48</sup> 戈爾巴喬夫這些叛徒作風多麼霸道，叛賣的野心多麼頑固不化，他一點兒也容不得人民群眾的不同意見，哪怕是善意的不同意見。戈爾巴喬夫這種人雖然披著共產黨人的外衣，但他沒有任何資格代表斯大林那樣的共產黨人或者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更不能把他們的霸道行徑與斯大林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同日而語。

在意識形態領域，真正在政治上大叫“反對壟斷”的也是戈爾巴喬夫之類的叛徒；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意識形態壟斷”的，也是這夥人。

他們大叫“反對壟斷真理”的目的就是為了掩蓋他們自己背叛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行徑，從而自己壟斷意識形態的權力，放手大搞叛賣活動。戈爾巴喬夫在1988年6月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上就提出：“我們肯定輿論多元化，擯棄精神壟斷的做法。”<sup>49</sup> 1989年12月26日蘇聯國家教委又發表命令，取消高校馬列主義必修課程。<sup>50</sup> 1990年2月蘇共通過的《行動綱領草案》竟然公開宣佈：“堅決擯棄對其他觀點與思想的意識形態限制”。<sup>51</sup> 戈爾巴喬夫利用職權通過了所謂《新聞出版法》，宣佈“新聞自由”，“不允許壟斷任何一種輿論工具”。接著，又下達總統令，命令國家的廣播電視事業“獨

---

<sup>48</sup> 李瑞琴：〈23年後俄羅斯媒體重提《我不能放棄原則》〉，《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第946期，第12~13頁。

<sup>49</sup> (蘇)戈爾巴喬夫：〈在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蘇聯《真理報》1988年7月1日。

<sup>50</sup> 李慎明主編：《居安思危——蘇共亡黨20年的思考》第188頁。

<sup>51</sup> 李慎明主編：《居安思危——蘇共亡黨20年的思考》第188頁。

立於政治和社會組織”，“反對壟斷輿論工具”。<sup>52</sup> 戈爾巴喬夫為此撤換了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利加喬夫，讓雅科夫列夫這個階級異己分子主持意識形態。雅科夫列夫不僅撤換了大部分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報刊的負責人，組建了搞垮蘇聯的大眾傳媒隊伍，而且公開否定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雅科夫列夫在 1991 年 8 月 2 日接受塔斯社採訪時說：“我反對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行動指南，斷定社會主義會失敗。”<sup>53</sup> 戈爾巴喬夫的“反對意識形態的壟斷”為其“公開性”鋪平了道路。原來，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就是公開攻擊和取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就是公開攻擊和否定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公開攻擊和禁止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就是這樣，蘇聯被抽掉了靈魂，迷失了方向，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深淵。在思想戰線上，正是這夥大叫反對“壟斷真理解釋權”的人，導致了蘇聯的徹底覆滅。

#### 5、所謂的“三壟斷”與腐敗的關係

在分門別類地批判了“三壟斷”之後，李凌最終把蘇共腐敗的罪責歸因於“三壟斷”。他說：“‘三壟斷’使蘇共獲得了不受任何制約的絕對權力。這種權力必然產生腐敗。”<sup>54</sup>

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在斯大林時期最終定型。這個制度有三個突出特點：第一，聯共（布）是全國唯一的領導力量。第二，蘇維埃制度是國家的根本制度。第三，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處於指導地位。<sup>55</sup> 按李凌的邏輯，斯大林時期可謂“三壟斷”最典型的時期，這個時期卻基本上沒有腐敗現象。那時的蘇共雖然也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整個說來是一個領導有力、意志統一、目標堅定、充滿信心的政黨。那時的蘇聯雖然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畢竟是一個艱苦

---

<sup>52</sup> 李慎明主編：《居安思危——蘇共亡黨 20 年的思考》第 188 頁。

<sup>53</sup> 李慎明主編：《居安思危——蘇共亡黨 20 年的思考》第 180 頁。

<sup>54</sup>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香港傳真》No.2011~64 期，第 26 頁。

<sup>55</sup> 李慎明主編：《居安思危——蘇共亡黨 20 年的思考》第 77 頁。

奮鬥、團結穩定、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多民族國家。蘇聯人民在法西斯入侵面前，表現出團結奮戰、同仇敵愾、不怕犧牲的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布爾什維克早期的領袖都保持了廉潔的品德。俄羅斯學者尼·阿爾圖寧寫到：“當斯大林逝世之際，他給個人留下什麼？工作人員在他的駐地僅僅找到幾雙織補過的短襪子，幾雙鞋跟都已磨破的皮靴，兩套軍服：一套是他每天都要穿的，另一套是用於節日檢閱穿的。”<sup>56</sup> 那時，人們佩服的人物是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塑造的保爾·柯查金，是蘇聯作家柳·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筆下的英雄卓婭和舒拉。那時，人們愛唱的歌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反映著人們對現實的忠誠和對未來堅定的信心。這就是斯大林時代的黨風和民風。說什麼“三壟斷”必然產生腐敗，毫無根據。恰恰相反，往往是這種所謂的“三壟斷”逐漸變形、變味、只有形式而沒有實質的時候，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到了喪失理想、背叛事業、嚮往資本主義“普世價值”的時期，社會上才不可遏止地出現導致垮臺的腐敗。這就是歷史的事實和結論。

李凌在追究腐敗的個人原因時指責俄共的黨員幹部政治和文化素養太低，他認為：“十月革命的勝利使俄共在一夜之間，從被壓迫者變成了統治者。……由於文化和政治素養不高，許多俄共黨員並不具備自由、民主、法制、人權的觀念；他們在政務活動中不斷表現出了諸如專橫跋扈、驕傲自滿、爭權奪利、腐化墮落等歷代統治者常見的惡習。”<sup>57</sup> 十月革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參加者除了領導人具有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之外，一般的革命群眾和基層骨幹不可能是受到系統教育的知識分子。不要以為自己解放前混了個大學生身份，就看

---

<sup>56</sup> 李慎明主編：《居安思危——蘇共亡黨20年的思考》第261頁。

<sup>57</sup>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香港傳真》No.2011~64期，第26頁。

不起沒有大學文憑的人。讀過大學的人也有“專橫跋扈、驕傲自滿、爭權奪利、腐化墮落”的現象。沒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也有廉潔奉公、謙虛謹慎、兢兢業業的。李凌對革命參加者的這種評論明顯具有剝削階級偏見，這不是那種低俗的嘲笑“窮小子一步登天”的心態嘛。勞動人民出身的人、作為工人階級一部分的知識分子不應該有這種心態。那些參加革命的“許多俄共黨員並不具備自由、民主、法制、人權的觀念”，這難道就是他們“專橫跋扈、驕傲自滿、爭權奪利、腐化墮落等歷代統治者常見的惡習”的原因嗎？所謂的“自由、民主、法制、人權的觀念”，不就是一些人今天仍然念念不忘的所謂“普世價值”嗎？今天誰人不知，這種“普世價值”的騙人的本質！誰人不知所謂“普世價值”已經成為顛覆我們國家的旗幟！在對待無產階級領袖的評價上，李凌和我們就沒有“普世價值”！在對待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看法上，李凌和我們也沒有“普世價值”！在對待埃及、突尼斯、利比亞、敘利亞、伊朗、朝鮮、古巴等國際問題的評價上，李凌和我們也不會有“普世價值”。大而言之，美國把推行霸權主義、踐踏別國主權當作“普世價值”，但是全世界人們不會買它的賬！儘管在親美勢力的眼裡，美國人總是有理，他們的社會制度才是什麼常態和主流。但是全世界 99% 的人民大眾遲早會宣佈他們全是謊言和欺騙。佔 1% 的壟斷經濟利益的少數人永遠是偏見。今天還用這種所謂“普世價值”的修養標準來蔑視人民大眾，是不合時宜的，還是收起為妙。在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下，沒有文化的人民大眾只要翻身，可以學習科學，學習管理，學習科學世界觀，可以管好自己的事業。一時沒有文化，不會形成腐敗現象；只有那些鼓吹“普世價值”的人物，往往是大個頭的腐敗分子。

俄共和後來的蘇共黨員幹部的腐敗現象完全不是按照李凌這種分析發展的。導致蘇聯解體的最主要的腐敗現象是思想上背叛共產主義理想，背叛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背叛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行動

上追求金錢和享受，並利用改革提供的時機侵吞公有制的財產，化公為私、據為己有，為此不惜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正是這樣的敗類和腐敗葬送了蘇共和蘇聯。

我們中國人要保持無產階級政權永不變質，就要牢牢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在中國就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這才是防止和反對腐敗的大道理。毛澤東主席為防止黨內的腐敗做了精闢的分析和艱難的探索。今日的腐敗現象的嚴重性也使人們越來越看清腐敗現象的本質及其發生的原因。無論什麼人在我們面前喊什麼誘惑的口號，做出什麼聳人聽聞的說教，我們始終牢記社會主義的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一個：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這是唯一的目的。其他的具體的目標是否正確，都要以是否符合這一根本目的為標準。是否真心實意地堅持這一切，也正是出不出腐敗現象的關鍵。

## 二、民族利己主義的誘惑，不能改變 對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辯證思維

在李凌的文章中，專門有一個“蘇聯的社會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及其完結”的大專題，企圖以蘇聯歷史上推行大國沙文主義、霸權主義的行為，讓我們把蘇聯解體的現實當作“進步”來接受。這種企圖以民族利己主義的誘惑來沖淡人們對蘇聯解體性質的看法，在中國那些精神正常的人中，不會有多少市場。

### 1、“如喪考妣”與“幸災樂禍”

李凌的文章說：“蘇聯解體、蘇共垮臺，引起我國強烈震撼，有的先生們如喪考妣，他們罵戈爾巴喬夫是社會主義的叛徒。在這些先生們的心目中，只有像斯大林~勃列日涅夫那樣對政權、對經濟和真

理實行三壟斷，對內專橫殘暴，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對我國虎視眈眈，並揚言要對我國實行核打擊，對外窮兵黷武鎮壓捷克斯洛伐克、侵略阿富汗的社會主義‘才是’正宗的‘科學社會主義’，這些先生們對於社會主義的這種‘理解’真是令人難以理解。”<sup>58</sup>

什麼叫“如喪考妣”呢？意思就是像死了父母一樣地傷心和著急。這話好刻毒！對於蘇聯解體一事，社會主義國家的一般民衆再糊塗也不至於講出這種話。

這裡首先要弄清：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本質是什麼？如果蘇聯解體的本質是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學說，拋棄了一種僵化的舊模式，從此走上一條有俄羅斯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那就應該慶祝；如果不是這樣，如果其本質是徹底拋棄了科學社會主義、拋棄了共產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事業在一個大國的失敗，那麼堅持科學社會主義事業的中國人民到底應該是彈冠相慶還是表示悲哀呢？這不是一個立場和感情問題嗎？

如果從中國自身的安全角度來看，蘇聯的解體無疑解除了來自北方的軍事威脅。正如最近美國一家報紙《全球主義者》文章中所說的：“在中國，人們喜憂參半，一些人抱著對蘇聯的懷舊情緒為其解體深深遺憾，另一些人認為，隨著蘇聯解體，中國來自北部的威脅也消失了。”<sup>59</sup> 但是，人們不會因為對蘇聯過去實行霸權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的威脅不滿，而對蘇聯的解體幸災樂禍。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就像幾個弟兄們之間，可能存在尖銳的利益之爭和其他矛盾衝突，但絕對不會看到一個弟兄被強盜陷害致死或者上了敵人的當、陷入滅頂之災，其他的弟兄感到開心，或者因此認同這一現象。

---

<sup>58</sup>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香港傳真》No.2011~64期，第50頁。

<sup>59</sup> 盧長銀等：〈世界冷議蘇聯解體20年〉，《環球時報》2011年12月26日，第6版。

在幾十年的時間裡，在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關係方面，蘇聯身上確實積累著豐富的、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和教訓。這裡面既包括列寧、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對世界人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支持和無私援助，對民族解放運動的貢獻，也包括有些領導人特別是背叛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領導人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等對兄弟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兄弟的共產黨人的干涉和破壞。

社會主義事業是史無前例的進步事業，是世界歷史上的新生事物。總的看來，有些新的因素一時還缺少經驗，難免出現錯誤。如：社會主義國家由蘇聯一家到眾多的社會主義國家組成的社會主義陣營，由蘇聯一國獨處於資本主義世界到眾多的社會主義國家共處於世界，對這些問題確實不存在現成的經驗。這些眾多的社會主義國家相聚一起，面對帝國主義的威脅和分化，面對相互之間複雜的歷史和現實的關係，到底怎麼樣相處才能最有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確實需要一個實踐和探索的過程。通過實踐和探索的過程，總結經驗教訓，才能使得社會主義國家走向正常的相互關係的軌道。如果抓住蘇聯在歷史上出現的對待相互關係上的曲折或者錯誤，甚至抓住多年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嚴肅批判過的背叛社會主義事業的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等人的錯誤行為來否定蘇聯的基本正確的歷史，那是完全錯誤的立場、錯誤的判斷。同時，這樣的判斷和立場也掩蓋和否定了蘇聯對世界人民的鉅大的國際主義的貢獻。

過去，儘管某些蘇聯的領導人在中蘇關係上出現過錯誤，但那畢竟是他們的性質還沒有變化，還有糾正的餘地和可能，他們畢竟還沒有徹底拋掉馬列主義的旗幟，畢竟還沒有徹底搞掉公有制，畢竟還沒有丟棄共產黨這個名字，還不一定發生歷史的大倒退、人民的大災難。中國人民只是在這個意義上不願意看到蘇聯的垮臺。

在中蘇關係問題上，有人借譴責蘇聯對華政策來否定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既然這樣，為什麼不同時充分肯定毛澤東主席領導我們對

蘇聯黨內的修正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的鬥爭呢？還有人反過來，借中蘇關係的是非，來否定毛澤東時代，否定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在中蘇關係問題上的這樣兩種極端的傾向，實際上都來自同一個傾向：這就是現實中企圖利用一切矛盾和事端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開創者的傾向。有些人奉行的是雙重價值判斷的標準。這種現象使人民依稀看到了歷次反共浪潮中西方敵對勢力的圖謀和手腳。

中國人民還是會從大局著眼看待蘇聯解體的，不會僅僅看到自己國家在北方的陳兵百萬嚴峻局勢的消失，而對蘇聯的解體幸災樂禍。同樣，中國人民也不會看到蘇聯解體使得東歐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徹底解除了被干涉的可能性而認為蘇聯解體是什麼值得慶祝的好事。只有對社會主義事業抱著敵對情緒的人和社會主義的叛徒才會對蘇聯解體從內心爆發出狂熱的興奮。

## 2、對華“專橫殘暴”和“陳兵百萬”的不是斯大林時代

在社會主義國家的交往歷史上，蘇聯與社會主義中國的關係經歷了斯大林時代，也經歷了斯大林之後的執政者的時代。雖然在斯大林時代也有一些內部的不同意見和矛盾，但總的說來，在毛澤東和斯大林主持簽訂的《中蘇友好互助條約》的指導下，那是一個中蘇友好的時代，蘇聯支持和幫助中國的時代。在斯大林之後，由於其不肖子孫背叛社會主義原則，中蘇之間經歷了文、武衝突的兩個時期：即赫魯曉夫時期的“文衝突”，和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武衝突”。

赫魯曉夫執政時期，雖然發動了大反斯大林的活動，但是卻沒有擺脫大國主義、大黨主義的錯誤傾向，沒有得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應有的教訓。在一定的意義上，由於赫魯曉夫背叛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大大地發展了這些錯誤。因此，中蘇之間，發生了許多分歧和衝突，不過這些分歧和衝突，當時還限於筆墨官司，是一種文的衝突。最早表現為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的《秘

密報告》。對此，中國共產黨經過認真研究和討論，於1956年4月和12月，以中央政治局的名義在《人民日報》正式發表政論文章〈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堅持科學地總結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對於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斯大林給予客觀準確的評價。接著，在1958~1959年期間，赫魯曉夫提出建立中蘇“共同所有、共同使用”的長波電臺，要求在中國的沿海建立一支共同的潛艇艦隊，遭到毛澤東的斷然拒絕。這本來是理所應當的。但是赫魯曉夫卻在日後採取了對華制裁的態度，在中國遇到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的年景下，赫魯曉夫撕毀條約、撤回蘇聯專家，催還昔日抗美援朝時期的貸款，給中國共產黨人施加了鉅大的壓力。接著，赫魯曉夫又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發動圍攻中國共產黨的國際會議，提出種種刁難，挑起中蘇大論戰，妄圖孤立和瓦解中國共產黨。這是完全錯誤的。中國共產黨人對赫魯曉夫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從理論上闡明了正確的立場，回擊了赫魯曉夫的挑釁，揭露了赫魯曉夫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本質。這場爭論雖然激烈，但還是屬於筆墨官司的範圍。後來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一聲鉅響之時，赫魯曉夫也剛好從領導崗位上被趕走了。修正主義者的下臺，中國人民當然是高興的。我們希望從此蘇聯能夠在新的領導人上臺後改弦更張、改正錯誤，修好中蘇關係。

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本來可以在總結赫魯曉夫執政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重新調整中蘇關係，尋求新的前景，取得新的進展。但是勃列日涅夫卻死抱著赫魯曉夫的錯誤不放，聲言堅持赫魯曉夫的二十大確定的綱領和方針路線不動搖。這不僅會陷入停滯時期，而且還會激化社會主義國家的相互關係，弄出武裝衝突的後果。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在中蒙邊境、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在中國東北邊境和西北邊境不斷挑起武裝衝突，極大地破壞了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正常關係。當年勃列日涅夫挑起了在中國領土珍寶島上的流血武裝衝突，在中國

的新疆發動大規模的騷亂，擄掠中國居民。這些行為完全達到了社會帝國主義的性質，遭到中國人民理所當然的抗擊。

經過與這兩個叛離馬列主義的統治人物的周旋，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更加懷念偉大的列寧、斯大林及其領導的時代。中國共產黨人也從這兩個反面的不肖子孫身上得到了許多啟發和教育。即使在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領導的時期，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從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大局著眼，衷心地希望蘇共領導人有朝一日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馬列主義的正確路線上來。我們希望蘇共的健康力量經過鑒別的鬥爭，戰勝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這樣的修正主義者。我們絕對不會像李凌那樣的態度，由於中蘇之間的衝突，就希望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垮臺，更不會看到後來的蘇聯解體而幸災樂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幸災樂禍是西方敵對勢力的態度，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庸人的態度，絕對不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態度，也不是中國人民的態度。

### 3、社會主義國家的相互關係需要獨立自主，不需要指揮中心

本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世界上只有蘇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中，蘇聯獨立直行，雖有曲折，不會影響別國的全局，也不難調整。但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逐步出現了由十幾個國家組成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陣營。這樣就出現了一個新問題：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相互關係如何規範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各國共產黨人經過幾十年的實踐，才找到了正確的結論。

最初，為了對付帝國主義的威脅，加強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各個社會主義國家以蘇聯為中心，結成社會主義陣營。實際上，由於蘇聯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居於指揮和領導地位。但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只承認蘇共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召集人”地位，不承認其“指揮”的地位。當時蘇共赫魯曉夫對波蘭的干涉，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表達了不同意見。赫魯

曉夫出於實用主義，對南斯拉夫的態度三翻四復，中國共產黨人也與之有較大的分歧。中國共產黨人雖然對蘇聯的指揮作用有很大的保留，但從社會主義事業的大局出發，畢竟在行動上也是維護蘇共的中心地位的。毛澤東主席 1957 年參加莫斯科國際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期間，甚至與一些兄弟黨做工作，維護了“蘇聯為首”的方針。

但是，隨著蘇共領導人背離馬列主義的程度的加深，隨著大國主義、大黨主義的發展，勃列日涅夫的行為越來越顯露出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破壞作用。他不但拋出了荒謬絕倫的“主權有限論”、“國際專政論”，還付諸實踐。他幹出了挑起中蘇邊界武裝衝突的行徑，他幹出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徑，他幹出了出兵阿富汗的行徑。勃列日涅夫時期對東歐各國的“社會主義國際大家庭論”、“國際分工論”，都體現了霸權主義和民族自私的色彩。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充當指揮中心的實踐是失敗的，也是不符合潮流的。這樣的國際指揮中心必然被逐步認識和淘汰。

隨著世界政治格局的大分化、大動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 70~80 年代逐步總結了新的經驗，有了新的體會，得出了新的結論。這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經不需要一個專門指揮別國的中心存在。各社會主義國家的相互關係應該是獨立自主、相互平等，不在需要一個指揮中心在那裡指手劃腳、評頭論足。

鄧小平在新時期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這一經驗做了深刻的總結。他說：“各國黨的國內方針、路線是對還是錯，應該由本國黨和本國人民去判斷。最瞭解那個國家情況的，畢竟還是本國的同志。但是，一個黨和由它領導的國家的對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別國內政，侵略、顛覆別的國家，那末，任何黨都可以發表意見，進行指責。我們一直反對蘇共搞老子黨和大國沙文主義那一套。他們在對外關係上奉行的霸權主義的路線和政策。”“總之，各國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國的黨、各國的人民，由他們自己去尋找道路，去探索，去解決問

題，不能由別的黨充當老子黨，去發號施令。我們反對人家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也不能對人家發號施令。這應該成為一條重要的原則。”<sup>60</sup>“任何國家的革命道路問題，都要由本國的共產黨人自己去思考和解決。”<sup>61</sup>

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戈爾巴喬夫並沒有記取什麼教訓。相反，他不但背叛和出賣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而且極力敗壞東歐各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以向美國主子邀功領賞。他以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一貫的老子黨的架勢，曾向民主德國領導人昂納克施壓，讓其搞“公開性”一類的所謂“改革”。遭到昂納克抵制之後，就發表演說，挑動德國黨內外的不滿，掀動德國的動亂。由於羅馬尼亞長期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不買他的賬，他就參與策劃羅馬尼亞邊界的動亂，支持羅馬尼亞國內的反對派，搞垮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在齊奧塞斯庫的軍隊與反對派的軍隊激烈戰鬥時，戈爾巴喬夫指使蘇聯塔斯社廣播電臺公開廣播，蘇軍航空兵的飛機，已經滿載作戰物資源源不斷地運往反對齊奧塞斯庫的民主陣線一邊。在東歐各國的劇變過程中，在各國黨的生死存亡的關頭，戈爾巴喬夫都旗幟鮮明地支持搞垮共產黨、搞垮社會主義制度的勢力。充分暴露了他的社會主義叛徒的醜惡嘴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遲早會一致清算這個叛徒的罪行。

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相互關係的問題上，各社會主義國家只是希望蘇共不要充當老子黨，不要把其他黨看做兒子黨，不要指手劃腳，要與其他兄弟黨平等相處，但絕對不希望蘇共變質、垮臺，絕對不希望出現類似戈爾巴喬夫這種叛徒行徑。

#### 4、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立足國情、相互借鑒，不需要照搬任何模

---

<sup>60</sup> 鄧小平：〈處理兄弟黨關係的一條重要原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册，第199~200頁。

<sup>61</sup>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頁。

式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衆多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還共同遇到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各個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到底應該怎麼搞？是應該統統照搬最早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一個模式呢，還是根據各個國家的實際情況，把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與本國實際相結合？這個問題，今天已經不成其為問題了。但在當時，誰也不是天才，都要經歷一個實踐過程才能被各國認識清楚。

應該說，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由於在長期的革命鬥爭歷史中摸索的經驗，較早對此有正確的理性認識。他一貫倡導馬克思列寧主義必須與各國實際相結合的原則。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走了一條很有特色的道路。因此，在中國學習蘇聯的過程中，毛澤東較早地就在 1956 年的《論十大關係》中清楚地表達了根據各國實際情況搞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毛澤東主張學習蘇聯的經驗要有分析，只學習好的經驗，不學習那些錯的東西，堅決反對照搬蘇聯模式的做法。

中國共產黨堅持把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與本國實際相結合，毛澤東堅持探索一條“中國式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第一，這是很不容易的，付出了一定的代價。第二，這也是有意義的，必須具有獨立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的強大支撐。否則，如果處於東歐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地位，在當時蘇共的控制下，也很難成功。南斯拉夫、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等國也曾經努力探索符合本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但都被蘇共視為異端，加以打壓，遭到失敗。原因就是當時這些國家在經濟和軍事上不能單獨與蘇聯抗衡，不能獨立支持。直到 20 世紀 80 年代的改革時期，戈爾巴喬夫仍然頑固地推銷自己的“新思維”，妄圖讓別國照搬當時蘇聯的改革模式，留下千古罵名。可惜，東歐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在認識到這一真理之時，也正是遭到戈爾巴喬夫出賣之時，他們還沒有來得及改換發展

的思路，就走向了不歸之路。這真是世界歷史的大悲劇。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各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照搬一個國家的模式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各國在實踐中認識到：社會主義建設必須根據自己的國情，建設符合自己特點的社會主義。鄧小平的總結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早在1979年3月，他就指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闢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sup>62</sup> 後來他進一步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sup>63</sup> 中國出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朝鮮出現主體精神的社會主義，越南出現了革新開放的社會主義，古巴出現了卡斯特羅式的社會主義，這是正常的現象，這是事物發展的常態。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人們，事物自身具有的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在實踐中是結合的。世界上沒有一片相同的樹葉，也不可能有一個簡單劃一的社會主義模式。世界歷史的發展具有統一的方向和規律性，但是歷史的發展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進程不是齊步走，做法不是一律的，表現出多樣性是必然的。歷史發展的統一性決定事物的本質和共性，歷史發展的多樣性決定事物的具體形態和個性。各個社會主義國家不應該照搬蘇聯的模式，只是不能簡單照搬蘇聯的一些具體做法，卻不能不遵守社會主義國家的共性，不能拋棄蘇聯模式中體現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

---

<sup>62</sup> 鄧小平：〈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思想基本原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冊，第44頁。

<sup>63</sup> 鄧小平：〈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冊，第466頁。

本原則。

### 三、蘇聯解體是社會主義事業和人民大眾的災難， 不是任何意義的進步

在當今世界上，除了把社會主義國家稱為“暴政”和“專制”、“極權”的西方敵對勢力，是不會有人把蘇聯解體視為進步的。

#### 1、蘇聯解體對於蘇聯和俄羅斯人民都是一場災難，沒有進步意義

李凌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有一個題目叫做“俄羅斯聯邦改革的陣痛和進步”。<sup>64</sup> 李凌說：“俄羅斯寧願忍受改革的陣痛，也堅持政治改革”。<sup>65</sup> 把歷史性的災難叫做進步，這是李凌奇特的發明。

李凌說人民“寧願忍受陣痛”也堅持政改。在葉利欽利用“五百天計劃”把俄羅斯搞得民不聊生的時候，請問：誰願意忍受這種“陣痛”？只有沒有任何“陣痛”感覺的葉利欽之類的人物。堅持這種“政改”的不是人民大眾。

人民大眾是反對和揭露這種“政改”的。當時安德列耶娃的信〈我不能放棄原則〉就是證據。安德列耶娃指出：“所有的瘋狂的攻擊都和他（斯大林——作者註）的名字連在一起，在我看來，這種瘋狂與其說是針對這位歷史人物，還不如說是針對那個極端複雜的轉折時代。”“我們認識到現今對我國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當時領導人的攻擊不僅僅是一種政治的、意識形態的以及道德上的事件，它還關係到這個社會的根基。”“與那些許久以前就在西方打出聲威的‘反斯大林主義’的民主口號的專業反共人士混在一起的，是那些生活在國

---

<sup>64</sup>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香港傳真》No.2011~64期，第50頁。

<sup>65</sup>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香港傳真》No.2011~64期，第52頁。

外、被十月革命廢黜的階級的子孫們。他們當中不是所有人都想忘卻祖先所失去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他們“正努力‘通過復辟來推翻社會主義’，或者換言之，回到社會主義之前的俄國社會制度中去”。<sup>66</sup> 安德列耶娃的話真是一針見血地揭露了一切復辟舊勢力的陰謀。當時該文發表後，蘇共主席團成員利加喬夫、沃洛特尼柯夫、葛羅米柯都認為這是一篇好文章，“論述很到位”。<sup>67</sup> 蘇聯各地報紙轉載了 937 次。作者所在單位列寧格勒工學院和《真理報》收到來自各地的來信上萬件，80%贊成安德列耶娃的意見。由於這封信的預見被歷史證明，在其發表 20 年、23 年的時候，俄羅斯國內都有大量的愛國者舉行活動，紀念這封信的發表。在蘇聯，只有戈爾巴喬夫一意孤行，反對這封信，並把它打成“反對改革者的宣言”進行壓制。

李凌說：“自新憲法公佈之後，沒有發生過嚴重政治對抗”，“選舉失敗的政黨和政治家都承認選舉結果”。<sup>68</sup> 不料，不久前就來了一個現世報，李凌的判斷被歷史事實粉碎了。在蘇聯解體 20 週年之際，在李凌宣佈俄羅斯新憲法公佈之後沒有發生過嚴重反抗，選舉失敗的政黨和政治家都承認選舉結果的時候，俄羅斯全國出現 2011 年 12 月 10 日和 24 日的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活動。12 月 10 日的示威遊行在莫斯科就集聚 2.5 萬人。遊行集會者揮舞旗幟，呼喊口號，抗議國家杜馬選舉舞弊，並要求重新舉行“誠實的選舉”。遊行示威波及聖彼得堡、車里雅賓斯克、托木斯克、海參崴等全俄 50 個城市，僅莫斯科就動員了五萬名軍警，警察排成人牆，數百人被捕。這是近 20 年來最大規模的反抗示威活動。據鳳凰臺報道：莫斯科 24 日的示

---

<sup>66</sup> 李瑞琴：〈23 年後俄羅斯媒體重提《我不能放棄原則》〉，《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第 946 期，第 6~8 頁。

<sup>67</sup> 李瑞琴：〈23 年後俄羅斯媒體重提《我不能放棄原則》〉，《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第 946 期，第 10 頁。

<sup>68</sup>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香港傳真》No.2011~64 期，第 55 頁。

示威遊行人數比上次翻了一番，達到五萬人之眾，已有 350 萬人支持抗議活動，在網上簽名的達五萬多人。根據俄羅斯社會輿情研究中心的一個調查，全國投票評選 2011 年國內外大事，結果：利比亞事件和日本福島核電站事件當選為國外最大新聞；國家杜馬選舉作弊事件當選國內最大新聞。<sup>69</sup>

在今天，最大的歷史性災難則是：付出極大的代價，把新世界當成舊世界打碎，之後感到無限的迷茫。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就是這樣。

普京對蘇聯解體的評價：“我深信，蘇聯解體是全民族的鉅大悲劇。我認為，前蘇聯的普通公民和後蘇聯空間內的公民、獨聯體各國公民、普通的公民們沒有從中贏得任何東西。”<sup>70</sup>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季塔連科認為：“你們到了莫斯科以外幾乎所有地方，都可以進一步體會到蘇聯解體、蘇共亡黨給我們國家、民族和人民帶來的嚴重災難。”<sup>71</sup> 季塔連科還認為：“這是文明的倒退，也是整個世界的倒退。這給居住在蘇聯境內各民族帶來鉅大的苦難，使這些民族的發展進程倒退了幾十年。”<sup>72</sup> 俄共總書記久加諾夫也認為：“對於蘇聯人民來說，這是嚴重的災難。這場使蘇聯人民經歷的嚴重內傷，直到現在還沒有痊愈。”<sup>73</sup> 著名作家、前持不同政見者馬克西莫夫臨終前告訴《真理報》記者：“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對現實發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痛心”，自己的祖國被糟蹋成這個樣子，好像“眼睜睜地看著

---

<sup>69</sup> “莫斯科民衆聖誕大示威抗議杜馬選舉舞弊”，鳳凰衛視《正點新聞》欄目 12 月 24 日。

<sup>70</sup> （俄）亞·維·菲力波夫：《俄羅斯現代史》第 8 頁。

<sup>71</sup> 李慎明主編：《居安思危——蘇共亡黨 20 年的思考》第 261 頁。

<sup>72</sup> “居安思危之三”課題組：〈蘇聯亡黨亡國 20 年祭——俄羅斯人在訴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第 960 期，第 5 頁。

<sup>73</sup> “居安思危之三”課題組：〈蘇聯亡黨亡國 20 年祭——俄羅斯人在訴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第 960 期，第 5 頁。

自己的母親被強姦一樣。再沒有比這更難受的了”。<sup>74</sup> 伏爾加格勒一位官員思前想後感到非常迷茫：“現在很迷茫：我們的過去錯了，將來要往哪裡走？我們一無所知！”<sup>75</sup>

在俄羅斯，人們體驗了改朝換代的陣痛，但卻沒有得到進步的補償。1990~2000 年間，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 52%，物價飛漲五千多倍。犯罪率飆昇，解體以來每年殺人案兩萬多起，2002 年竟然達到 3.2 萬起，每年有 20 萬人被害。迫於生活壓力，每年有 50 萬婦女流落到國外賣淫。2005 年男子的平均壽命比 1990 年代降低了 4.8 歲，僅僅 58.6 歲，成為全歐男子壽命最低的國家。<sup>76</sup> 這種現實與蘇聯時代相比，有什麼進步的意義呢？

1995 年，“社會輿論基金會”在一項民意調查中，問及是否贊同西方評價戈爾巴喬夫為“傑出的改革家”的時候，贊同的佔 24%，不贊同的佔 63%；問及戈爾巴喬夫為民族帶來的利益多些還是危害多些的時候，認為帶來的利益多些的佔 11%，認為危害更多的佔 53%。<sup>77</sup> 這才是俄羅斯的民意。

## 2、蘇聯解體對於世界也是一場災難，沒有進步意義

蘇聯解體的過程就是戈爾巴喬夫出賣東歐各個社會主義國家、放縱西方宰割的過程。蘇聯解體之後的世界格局，美國的一國獨霸，肆無忌憚，到處發動戰爭、到處干涉別國內政的狂潮，正是戈爾巴喬夫這類叛徒配合美國逞兇的預期目的。西方對戈爾巴喬夫的報償就是對其夫婦倆的高額的稿費和給戈氏的諾貝爾獎。而全世界人民得到的卻是自二戰結束以來空前的災難，霸權主義更加肆無忌憚地欺辱發展中

---

<sup>74</sup> “居安思危之三”課題組：〈蘇聯亡黨亡國 20 年祭 — 俄羅斯人在訴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第 960 期，第 6 頁。

<sup>75</sup> 李慎明主編：《居安思危 — 蘇共亡黨 20 年的思考》第 8 頁。

<sup>76</sup> 李慎明主編：《居安思危 — 蘇共亡黨 20 年的思考》第 8~9 頁。

<sup>77</sup> (俄)亞·維·菲力波夫：《俄羅斯現代史》第 311~312 頁。

國家的災難。

俄羅斯新出版的《俄羅斯現代史》指出，“戈爾巴喬夫有意推動東歐國家非共產主義化”。<sup>78</sup> 這是真的。

戈爾巴喬夫首先干涉和搞垮了波蘭的社會主義政權。1989年當波蘭的執政黨統一工人黨（共產黨）與本國的反對派“團結工會”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戈爾巴喬夫進行了干預。1989年8月22日，他打電話給波蘭共產黨領導人拉科夫斯基，說服他：必須合作，將政權交給‘團結工會’”。<sup>79</sup> 戈爾巴喬夫利用蘇聯傳統的影響力迫使波蘭共產黨領導人讓出政權，成為東歐第一個垮臺的社會主義國家。得知波蘭垮臺信息之後，美國國務卿貝克說：“戈爾巴喬夫馴服了一隻虎，想來，他甚至已經在鞭策他了。”<sup>80</sup>

民主德國的劇變也是在戈爾巴喬夫一手主導下實現的。1989年10月，戈爾巴喬夫參加東德國慶期間，就向昂納克施壓。《俄羅斯現代史》是這樣記載的：“在柏林會晤時，戈爾巴喬夫對昂納克說話非常嚴厲。他證實，停止國內遊行示威的唯一方法，就是按照蘇聯模式走改革路線，只有這樣，昂納克才能拯救自己的政府。”“回到莫斯科後，戈爾巴喬夫對其戰友們說，昂納克必須下臺，而且要越快越好，因為‘東德領導人已不能控制局勢’”。<sup>81</sup> 在德國統一問題上，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外交助手謝瓦爾德納澤的積極推進態度，甚至連英、法這樣的西方國家都十分擔心，很不情願。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就派外長赫德到莫斯科，勸俄國人停止投降。<sup>82</sup> 但戈爾巴喬夫看重的是美國人的眼色和自己眼前利益。就這樣在全世界人們面前把民主

---

<sup>78</sup>（俄）亞·維·菲力波夫：《俄羅斯現代史》第282頁。

<sup>79</sup>（俄）亞·維·菲力波夫：《俄羅斯現代史》第282頁。

<sup>80</sup>（俄）亞·維·菲力波夫：《俄羅斯現代史》第282~283頁。

<sup>81</sup>（俄）亞·維·菲力波夫：《俄羅斯現代史》第283頁。

<sup>82</sup>（俄）亞·維·菲力波夫：《俄羅斯現代史》第286頁。

德國出賣和毀滅了。

在改革出現動亂的緊急關頭，許多國家需要當地駐紮的蘇軍支持的時候，戈爾巴喬夫藉口“不干涉”，把蘇軍先後從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撤出，實際上在關鍵時刻中斷了與這些所在國家的軍事合作。在這些國家認真考慮自己的發展的時候，戈爾巴喬夫又兇相畢露地逼迫這些國家拱手讓出政權，給這些國家造成極大的災難。保加利亞本來是一個社會經濟發展較好，民風和諧，物資供給比較豐富，發展水平較高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在戈爾巴喬夫的各種關係的影響下，也發生動亂，改旗易幟，國家變質。之後，經濟上物資供應緊張，社會秩序混亂，連許多烈士和居民的墳墓都被毀壞。當地老百姓紛紛感慨：“現在連死人也不得安寧！”

戈爾巴喬夫向西方投降，徹底瓦解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使得蘇聯在地圖上消失。一個剛剛出現的俄羅斯遠遠不是美國的對手。這就徹底改變了兩個超級大國爭霸的格局，出現一國獨霸的局面。從此，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遭到一次次的戰爭和干涉，給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事業帶來鉅大的災難。在一個失衡的世界上，美國政府不可一世，大打出手、頻頻出擊。伊拉克被戰爭征服，接著戰亂不斷；南聯盟崩潰，民族分裂導致戰爭不斷；突尼斯被“茉莉花革命”摧毀，動蕩不安；埃及被分裂動蕩，領袖受辱；利比亞被戰爭洗劫，國家元首被殺。敘利亞正在遭受動亂之苦，美國人興風作浪、口出狂言；伊朗正在遭受戰爭威脅，美國揚言更新自己的鑽地炸彈，徹底摧毀伊朗的核設施。蘇聯消失，美國戰略重點東移，給中國帶來的麻煩也越來越多了。美國政府的氣焰之高，甚至不允許中國知識分子說話。一個大學校長只是在地方講話中，針對美國的霸權現象，批評美國的教育制度一塌糊塗，就遭到美國勢力的大加撻伐，真是太過分了。這使人想起了法西斯。這個世界如此不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蘇聯劇變而失衡。蘇聯的變化沒有也不可能給世界帶來什麼進步和安寧。

### 3、中國人民在蘇聯解體的教訓中得到寶貴的啓示

任何事實的作用都是辯證存在的。物極必反，相反相成。中國人民不希望蘇聯劇變。但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這是不以人的主觀願望為轉移的。不過蘇聯解體的災難後果對於中國人民來說，卻產生了深刻的啟示。鄧小平說：“東歐、蘇聯的事件從反面教育了我們，壞事變成了好事。問題是我們要善於把壞事變成好事，再把這樣的好事變成傳統，永遠丟不得祖宗，這個傳統就是馬克思主義。”<sup>83</sup>

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亞洲問題專家西格爾指出：“沒有一個外部事件比蘇聯解體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影響更大的了。”<sup>84</sup> 曾經著有《中國從蘇聯學習，1949 年至今》一書的美國學者伯恩施坦也指出：蘇聯是社會主義的搖籃，社會主義思想自 1917 年十月革命以來就影響著中國，社會主義突然在蘇聯消失，中國急需弄明白為什麼，蘇聯解體也影響了中國在美蘇中大三角中的地位。<sup>85</sup>

中國應該在蘇聯解體中吸收經驗教訓。這個問題學術界已經做出過深刻的專題研討，本人也發表過〈蘇共亡黨的四條教訓〉。<sup>86</sup> 這裡不再重複。

換一個角度看待這個問題，可以簡單地用一句話總結蘇聯解體的反面教訓：一定要堅持和戈爾巴喬夫對著幹。這就是：凡是戈爾巴喬夫搞垮蘇聯的那些手段，我們就堅決地揭露，使其不能再騙人；凡是戈爾巴喬夫壓制的那些不同意見，我們今天就要充分認識其價值；凡是戈爾巴喬夫信任的雅科夫列夫之類的骨幹，我們就要把它揭示清

---

<sup>83</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 年，第 1332 頁。

<sup>84</sup> 盧長銀等：〈世界冷議蘇聯解體 20 年〉，《環球時報》2011 年 12 月 26 日，第 1 版。

<sup>85</sup> 盧長銀等：〈世界冷議蘇聯解體 20 年〉，《環球時報》2011 年 12 月 26 日，第 1~6 版。

<sup>86</sup> 劉書林：〈蘇共亡黨的四條教訓〉，《環球時報》2011 年 5 月 17 日。

楚，讓這些異己分子沒有市場；凡是戈爾巴喬夫釋放出來的所謂理論，我們就堅決地批判，讓它像老鼠過街人人喊打；凡是戈爾巴喬夫過去創造的口號，我們就要對照後來的現實和事實，系統地整理總結一下，看看全世界是不是像他說的那樣都是拴在一根繩子上的爬山運動員，一損俱損？看看所謂批判斯大林的運動是不是為了維護列寧和社會主義制度？看看他當初騙人的時候怎麼說的，今天正好運用這些事實擦亮中國和世界人民的眼睛。只要這樣，中國就絕對不會發生類似蘇聯那樣的災難。

#### 4、世界歷史不會終結於資本主義

早在 160 多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在科學地考察了成熟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後，在《共產黨宣言》中向全世界宣佈：“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sup>87</sup>“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sup>88</sup>我們堅信馬克思恩格斯創始的科學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學說是真理，體現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我們不相信世界歷史終結於資本主義。我們不相信資本主義是什麼千年王國。

這些道理，不但為馬克思恩格斯以來的無產階級導師所指明，也為現今活生生的事實所不斷證明。在當今世界，看了代表 99% 公民利益的人民群眾佔領華爾街運動，看了塞爾維亞、伊拉克、突尼斯、埃及、利比亞、敘利亞、伊朗等國遭到的禍害，看了朝鮮、古巴遭受的種種威脅和刁難，看了敵對勢力在中國王府井街口策劃“帶路黨”活動的醜惡表演，看了他們利用互聯網信息方式顛倒是非、陷害忠良的邪惡行徑，看了中國駐南使館被炸事件、中國空軍飛機被撞事件……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難道還看不出：當今列強資本主義就是

---

<sup>87</sup> 〈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83 頁。

<sup>88</sup> 〈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第 284 頁。

野蠻、殘酷、戰爭、叢林政策、滅絕人性的典型代表。雖然，當代列強資本主義的代表在其國內還勉強裝出一副文質彬彬的樣子，但一到第三世界，其兇惡的本性就暴露無遺了。這些無情的事實將會而且已經教育了越來越多的世界人民。我們就是根據這些無情的事實，堅信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必然勝利！

在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解體之後，面對世界範圍的社會主義運動的低潮，鄧小平說道：“只要中國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堅持社會主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充滿信心。”<sup>89</sup> “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sup>90</sup> 這些都是不難理解的很樸實的道理。

---

<sup>89</sup>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21頁。

<sup>90</sup>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2頁。